

运用唯物史观“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

张艳国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历史学科建设发展,十分关心支持历史研究工作,明确了历史学科以及历史研究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史学事业繁荣发展创造了极其难得的时代条件、文化环境和比较优势。习近平在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中提出“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的重要要求和目标指向,对于推动当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史学精品力作,离不开唯物史观理论智慧的指引和启发。唯物史观理论和方法为史家主体“做”并“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提供了思想源泉和可靠路径。在当代,史学研究者至少可以从三个切入点着手:第一,找准研究的历史方位,立足问题载点,突出时代意识;第二,紧扣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和道路;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总体史观和历史发展规律论,聚焦中国历史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史家主体不仅需要具有“求真”的品格和勇气,还要具备“致用”的胆识、确立“致用”的目标,守科学研究之正,创史学研究之新,做有思想穿透力的研究,出有思想穿透力的成果,努力造就中国史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关键词 唯物史观; 思想穿透力; 史学研究; 精品力作

DOI:10.19992/j.cnki.1000-2456.2025.01.0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暨滚动资助项目“习近平关于历史科学重要论述理论内涵和重大意义研究”(LSYZD21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历史学科建设发展,十分关心支持历史研究工作,明确了历史学科以及历史研究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史学事业繁荣发展创造了极其难得的时代条件、文化环境和比较优势。特别是习近平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揭示了历史学以及历史研究的科学价值和地位,“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①;指出了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基础性、方向性、战略性目标,勉励广大历史工作者“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提出了加快构建包括历史学科在内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的知识体系”^②的重要要求^③。三者相辅相成、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形成一个逻辑严密的思想整体。历史学科所具有的科学地位和表现出的重要价值体现并赋能学科发展和研究内涵的目标指向,学科发展及其科学研究的目标走向支撑该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程度和高度,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质量充分表明它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深厚基础。史学研究者科学掌握习近平关于历史科学重要论述的思想内涵和理论方法,对于推动当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来说,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① 《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人民日报》2015 年 8 月 24 日,第 1 版。

②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26 日,第 1 版。

③ 参见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二〇一九年一月二日)》,见《习近平书信选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年,第 212 页。

推出具有思想穿透力的史学精品力作,这是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统称“三大体系”)建设的根本要求和鲜明指针,也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重要要求在历史学学科领域的主要内容和根本体现。“三大体系”和“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两个概念或者说命题,既相互关联,也有一定差异:前者是“述实”,突出强调“干什么”,规范主业、主责的内涵要素;后者是“述旨”,重点指向“实现什么目标”,这是立足于中国学术、中国思想、中国价值、中国意识的高度,科学阐释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现代政党的精神独立、精神自主和精神主导等一系列重大问题^①。很显然,后者的要求更具高度、更显深度、更有宽度。当代中国史学研究者自觉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②,就是要围绕“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构建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目标,促进中国史学创新发展,形成史学繁荣的新局面。

围绕“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目标,首先要明确“做”,即做有思想穿透力的史学研究,这是前提条件和可靠基础;然后才能“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它是“做有思想穿透力的史学研究”的必然结果,是其落脚点和归宿。两者前后贯通,相互促进。后者引导前者,前者通向后者,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缺一不可。为了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史学精品力作,对于史学研究工作者的主责和主业来说,关键在于“做”,它体现在“做”的过程中要树立严谨踏实的学风,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将史家主体的德、识、才、学有机融为一体,有“藏之名山”^③的职业追求。“做”是一辈子的努力和付出,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推出”是一时一事的成果落地,是一项研究工作的圆满结束。立足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实践深化,史学研究工作者就是要坚持围绕“精品力作”的目标导向,坚定地铆足干劲努力地“做”,在史学研究过程中贯穿“有思想穿透力”这一根本要求。

做到“研究有思想”,就是要体现出史学研究的主体性、反思性、批判性、思辨性和哲理性,唯实求是,求真致用,就是要在史学研究中善于运用科学理论和方法,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中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就是要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扎根中国大地并在实践运用中具有深沉的学力、过人的识力与雄奇的魄力,推进唯物史观与中国学术相结合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体现“思想有穿透力”,就是要运用学理的力量和真理的光芒驱散史学研究中的思想迷雾、解开史学研究中的思想困惑、破除史学研究中的思想纷扰,最终实现从“求异”“创新”到“聚同”“共识”的效果,从而得出“历史的启示”,得出“人的启示”^④。史学研究的“精品力作”,一方面来自于准确而扎实的史料,另一方面要体现出研究的前沿性、思想的深刻性、立论的新颖性和说理的哲理性,做到求知求真。对于当代中国史学发展来说,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史学精品力作,当然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思想源泉和智慧指引。事实上,习近平阐述的“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包含了运用唯物史观理论和方法指导历史研究和史学事业发展的重要要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史学研究中不断“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不断丰富人类对自身历史发展的认识,不断从中获得历史智慧的启迪。

那么,究竟如何做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史学精品力作呢?结合史学研究实际,笔者认为,史家主体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切入点着手。

一、找准研究的历史方位,立足问题载点,突出时代意识

马克思曾经精辟地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呼声^⑤。按照马克思这一论述的理论逻辑和思想内涵要求,可以说:思想是时代的口号^⑥。这就是说,历史研究不能把历史学当成甚至是搞成“死”学^⑦,而应当使它成为

① 参见张艳国:《以中国问题为中心推进“三大体系”构建》,《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10期。

② 参见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0页。

③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50页。

⑤ 马克思在《集权问题》中谈到,“每个时代的谜语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语都是该时代的迫切问题”,问题“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⑥ 参见张艳国:《邓小平历史自信思想的形成条件、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6期。

⑦ 郭沫若先生《三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中有句名言:“人是活的,书是死的。活人读死书,可以把书读活。死书读活人,可以把人读死。”见郭沫若:《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39页。

集人类高智商和高情商于一体,同情共感与情理合一,并且是充满生机活力的人学,即具有思想创造之学^①。笔者提出这个观点,得益于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陈旭麓先生的教诲,体现于他的经典著作《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之中,他认为:“历史是古老的,又永远是新陈代谢的。”^②历史发展的新陈代谢,其动力来自历史主体所具有的“否定之否定”的勇气和活力。同样得益于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的启发,体现于他的经典学术观点“对话与理解”^③，“对话与理解”强调的是史家的主体意识和时代意识,归根结底就是:居于现时代的史家主体必须与研究对象所处的时代进行同情共感式的“对话与理解”^④。

如何理解历史时代与历史认识的关系?这在史学史上,早就引起了史学家关注,他们已经发表过一些很有借鉴意义和科学价值的观点和看法。如果单纯地从史家主体意识和时代意识的史学认识论视角来看,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谓“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柯林伍德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点,还是有一定的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的^⑤。任何社会主体、实践主体的思想意识,都不是空中楼阁,它总是来源于一定的时代,受到社会实践的影响和启发,并继承和利用了前人有益的思想资料。由此,笔者认为,对于史家主体意识与史学认识的关系,更可靠的表述应当是:一切历史思想都是时代的启示。

譬如说,中国古代史学研究和近代史学研究,它们都直接来源于史家主体各自所处时代的启示,突出的都是时代意识,回答的都是“时代之问”。无论是中国古代史,还是中国近代史,都各有其所处时代历史的主线和主题。从汉高祖“刘邦之问”^⑥到唐太宗“李世民之问”^⑦,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的主线和主题始终是,破解古代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治乱兴衰“周期率”^⑧问题,寻找治国安邦的治理之道,它揭示的是“祖宗之法”在时代交替中“变”与“不变”的道理。从鸦片战争的枪炮声到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主线和主题始终是,破解近代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⑨问题,寻找救亡图存的救国之道,它揭示的是在“落后就要挨打”的时代启示中追赶世界、赶上世界潮流的道理。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说,我们聚焦中国当代史学研究,其立足点就是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与时代方位。这个历史方位与时代方位,就是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⑩。从哲学层面讲,这就是我们在史学研究中寻找问题、思考问题、研究问题的根本依据。伴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长时段地看,我们现在所处的新时代也有其主线和主题。其中,主线是道路问题,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主题是民族复兴问题,即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综观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发展,无不有自己的发展理想和奋斗目标,譬如,美国有“美国梦”^⑪,法国有

① 参见张艳国:《充分发挥历史学作为“有用之学”的社会功能》,《光明日报》2017年2月6日,第14版。

②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386页。

③ 章开沅先生在谈到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曾说,史学研究者要做到“今天”与“往昔”对话,“用我自己习惯语言来说就是‘设身处地’,而为此就必须通过潜在无声的对话与历史人物沟通以形成理解”,“把自己设想成处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根据确凿史料分析前人思想与行为的成因与后果,这样才有可能窥见其心灵深处的奥秘”。见章开沅:《实斋笔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323-325页。

④ 章开沅先生还曾将其表述为“同情与理解”,并阐释说:“作为历史研究者,应该走进历史、尊重历史、理解历史,把自己重新体验并赋予生命力的真正历史奉献给人类,这是一个艰巨和长期的任务,这也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章开沅:《同情与理解:解读五四时期评孔思潮中的文化纠结》,见张艳国:《破与立的文化激流:五四时期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命运》,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年,“序言”第5-6页。

⑤ 参见张艳国:《史学理论:唯物史观的视域和尺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92-393页。

⑥ 指汉高祖刘邦与谋臣陆贾关于“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讨论。参见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九十七《郿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269-3270页。

⑦ 指唐太宗李世民与大臣房玄龄、魏征关于“创业与守成孰难”的讨论。参见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唐纪》,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53页。

⑧ 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在著名的“窑洞对”中所谈论的话题,就是中国古代社会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10-611页。

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页。

⑩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72、23页。

⑪ 参见魏南枝:《梦想与挑战——中国梦与美国梦的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法国梦”^①,它们无非是表现为先发引领式和后发追赶式的差异而已。我们为之不懈奋斗的新时代中国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明的底色、本色和亮色。“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②中国道路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中国人在跋涉千山万水、克服千难万险、用尽千方百计、历经千辛万苦之后,自己走出来的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康庄大道^③。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紧扣“道路自信”问题,并以此聚合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深刻原因之所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历史自信”^④的崭新命题。“历史自信”居于统摄“四个自信”的地位,扮演着“管总”的角色,它是我国史学工作者认识问题 and 研究问题的要津和闸门^⑤。

总的来说,历史的长河永远是波澜壮阔、奔涌向前的,历史的发展总是处在奔流不息的新陈代谢运动中,深刻地蕴藏着“古今、新旧、中西”三大范畴。古今是历史发展的时代序列先后问题。中国历史从古到今发展,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其内容丰富,含括“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五史”既相对独立,又交互联系,汇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体现了中国历史必然汇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客观规律。新旧是事物发展先后性质的差异问题。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目标和价值选择,总是要与时俱进、瞻望未来。当代中国全方位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决定中华民族历史巨变的振兴之路、复兴之路,是中国人民走进世界主流的发展之路、进步之路,是现代化国家跻身世界强国行列的繁荣之路、富强之路。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顺应世界发展大潮,赶上时代、追求进步、勇于变革历史面貌的性质问题。中西是民族、国家历史发展产生横向联系、包容共生的空间定位问题。从世界现代化发轫以来,中国先进分子就一直在追赶时代发展潮流,做着中华民族的强国梦。如今,中国式现代化标志着中国跨越时空地走上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道路,正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从根本上解决了时空之“异”到人类文明发展之“同”的问题,凸显了在世界现代化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目标和前景,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发展包容、互鉴的特征和特点。历史发展表明,任何时代的主线、主题,都因“古今、新旧、中西”三大范畴而生发和规定。站在新时代中国社会变革新的历史方位上,我们只有立足问题载点,突出时代意识,才能正确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才能弥补史学研究中存在的理论不足、“碎片化”和“虚无化”等缺陷,才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光芒照亮史学研究工作前行之路。笔者相信,在新时代,按照这样的方法和路径去“做”史学研究,就一定能够“推出”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

二、紧扣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和道路问题

社会发展的正确选择,离不开人们对其所处社会性质的科学认识;反过来说,人们所走的社会发展道路,蕴含着社会性质这样一个重大而根本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⑥,“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⑦。这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个自然历史过程在不同地区、民族和国家中,不仅体现为常规性、统一性的发展道路,即以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依次交替为表现形式而展开并推进,而且体现为变异性、多样性的发展道路,即以社会经济形态的跳跃性更替为表现形式而展开并推进。无论是哪种社会发展形式,它们的总趋势和总归宿都必然是实现由原始公有制向高级公有制的复归^⑧。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社会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基础地位,是史学理论必须予以充分重视并长期坚持的科学理论。如果

① 参见郭春英编著:《辉煌与浪漫:法国》,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③ 参见张艳国:《李大钊、瞿秋白对俄国道路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④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页。

⑤ 参见张艳国:《运用历史智慧开创新时代伟业》,《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5月24日,第1版。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8页。

⑧ 需要加以补充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不仅阐述了其中的常规性发展道路,而且揭示了其中的变异性发展道路。即,在以常规性发展道路为表现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它是以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依次交替为表现形式而展开并推进的;在以变异性发展道路为表现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则是以社会经济形态的跳跃性更替为表现形式而展开并推进的。参见张艳国:《史学理论:唯物史观的视域和尺度》,第28-48页。

我们将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与历史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也就找到了立足于历史发展长河中的每一社会经济形态,做有思想穿透力的史学研究和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的深厚而坚实的问题着力点和思想载点。

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如何紧扣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问题和道路前景问题?首先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坚持和运用的生产力学说入手。应当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性质和特征,立论的基石是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力因素。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他们所看到的是近代化兴起时期的社会生产力。确切地说,是近代化发展以来被我们所认为的传统的社会生产力,其中包括煤炭、电力、石油、有色金属、钢铁、化学、铁路、机械建筑、高速公路等要素;它是以19世纪自然科学的极大进步,特别是“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进化论为实践依据和科学支撑而发展起来的。经典作家聚焦他们所处时代的生产力发展,从西欧历史发展出发研究“世界历史”,形成“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历史规律。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却并没有看到科学技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飞跃式发展,没有看到后来极具影响力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老三论”),以及此后出现的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和协同论(“新三论”),更没有看到现在的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云平台、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更为先进的生产力要素。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浪潮带来的生产力飞速发展和具有革命意义的跃迁,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以更加崭新、更加丰富的时代内涵和发展前景。

那么,能不能据此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已经过时了呢?当然不能这样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看到生产力在近代以后特别是在现代社会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但是,其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却科学地揭示并预见了人类社会历史在一定发展阶段的具体存在形式是同每一历史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①。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的发展和完善,必然经历人的依赖关系(直接的社会关系)、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物化的社会关系)和个人的全面发展(自由人联合体)三个阶段^②。它也是与经典作家从生产力的角度,划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大阶段相吻合的^③。当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是算命先生”^④,他们只能以其极具科学性和预见性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为我们提供“研究历史的指南”^⑤。以此为思想指南和研究路径,我们可以认为,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谁掌握了社会先进生产力,谁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谁站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立场上,谁就能够决定并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性质。当代中国改革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革命性变革,原因固然很多,但从社会生产力角度看,它无疑得力于我们着眼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将社会生产力由传统的历史形态推进到新质生产力的当代形态和中国形态^⑥,运用并发挥新质生产力的巨大潜能,不断加快和刷新中国前进的节奏和面貌,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稳致远、走向辉煌。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界、学术界,一直有一股质疑甚至是否定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杂音”,它在

① 恩格斯盛赞马克思一生中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大理论发现: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对于前者,恩格斯解释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02页。

②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写道:“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③ 参见徐光春主编:《马克思主义大辞典》,武汉:崇文书局,2017年,第218-21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6页。

⑤ 恩格斯明确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5页。

⑥ 参见康风云、邹生根:《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鲜明特征与培育路径》,《光明日报》2024年5月24日,第6版。

史学界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突出表现。因为它无视甚至抹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和取得的伟大成就,无视甚至抹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向“世界历史”的实践发展和远大前途。其认识缺陷是主观与客观相背离,历史逻辑的内涵本质与主观认识相背离。

由此说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跃迁,是我们认识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依据。中国当代史学研究出思想、出精品力作的一个可靠而重大的切入点,就是紧扣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紧扣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行规律,深刻阐释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紧紧围绕新质生产力,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宏大历史进程和深蕴其中的历史叙事和历史意识,科学揭示我们所走的路是一条发展中国、振兴民族、走向世界的社会主义道路。当代中国的改革发展所走的路,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是把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厚植于中国实践之中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理论创新。

人类社会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就是历史,历史从来都没有停止它的脚步。人们总是处在对历史研究求真致用的渴望和追求之中,如何做到求真致用,理论思维是历史研究的灵魂^①。现代中国是从近代中国、古代中国发展而来的,它的步履是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相契合的。这就是说,只有紧扣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这条“金线”,才能正确揭示中国发展的通衢大道——“中国道路”,并深入研究聚合在中国道路上的历史问题与时代问题相结合的重大“问题域”,才能把古代中国、近代中国、现代中国与未来中国有机联系起来,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理论威力和实践伟力。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古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成果。它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客观历史“合规律性”发展和历史主体“合目的性”追求的必然结果。由此可见,如果脱离甚至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历史认知,也不可能形成科学的中国历史观,也就不可能“做”有思想穿透力的史学研究,更不可能“推出”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总体史观和历史发展规律论,聚焦中国历史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问题

根据唯物史观,世界历史进程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自然历史发展过程(即“合规律性”),是一个合乎社会主体追求目的的社会变革过程(即“合目的性”)。由此出发,把中国当成世界的一个有机部分,把世界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依据,做有思想穿透力的史学研究并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史学精品力作,这就找准了中国融入世界的历史进路和中国向世界贡献优秀民族文化和文明成果的世界视角。近代著名学者刘咸炘有一句治史名言,他说,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风俗,“一纵一横,各具面目”^②。笔者认为,这八个字只是对社会历史现象的描述,如果要全面完整地揭示蕴涵其中的规律,那就要再续八个字:“纵横交错,构成整体。”所谓“纵”,就是在时间维度上的承继与延续;所谓“横”,就是在空间维度上的并存与组合。纵横交错,两者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平面的、单相的,也绝不是单线的、直线的,而是呈现为纵横交错、立体生动的格局和状态。纵横交错的发展,看似纷纷扰扰、错乱繁杂,其实既各有规律,更受到社会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制约。总之,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并不是偶然随机的、杂乱无章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简单堆砌,呈现出一种单线的、平面的状态,而是合规律的、具有内在联系的历史时间与历史空间纵横交错并体现主体目的性的有机整体,呈现为立体的、生动的、丰富的状态^③。这就如同李大钊在阐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时所指出的那样:“人类的社会,按时间的,纵起来看是历史;按平面的,空间的,横起来看是社会。”^④历史体现时序,社会充满内容,历史和社会发展都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定性和固有客观性。

① 参见张艳国:《理论思维是历史研究的灵魂》,《史学理论研究》2024年第4期。

② 原文为“一代有一代之时风,一方有一方之土俗,一纵一横,各具面目,史、志之作,所以明此也”。参见刘咸炘:《蜀诵·绪论》,见段渝主编:《刘咸炘论史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64页。

③ 参见张艳国:《史学理论:唯物史观的视域和尺度》,第258-262页。

④ 《李大钊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8页。

章开沅先生常说：“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①历史如同一艘远行的航船，它是由甲板、侧板、底板、船首柱、船尾柱等诸多要件组合在一起构成的一个坚固整体；史学研究就是研究者凭借自己的思想、判断、规划和目标设定来驾驶这艘历史航船。要想在航行中一帆风顺，关键是要有思想作为其指南针、压舱石、风向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精辟地指出，人类社会历史总是在“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和“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中“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②。研究者感知历史，追寻“历史之谜”，揭示历史的真相，靠的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硬功夫，靠的是运用理论思维所体现的思想穿透力，打通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得出深入历史的智慧启迪。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总体史观和历史发展规律论为我们从事史学研究解开了“历史运动之谜”^③。从根本上讲，它就是我们驾驶历史航船的指南针、压舱石、风向标，是我们进行“永无止境的远航”的理论指导和方法遵循。

应当承认，关于在史学研究中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总体史观和历史发展规律论问题，史学界一直存在“杂音”的，在某些时期甚至一度甚嚣尘上。有人认为，总体史观和历史发展规律论在根本上不可能探知人类社会的过去和未来，或者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总体史观和历史发展规律论。他们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史学思潮中生搬硬套、生吞活剥外来观念或理论，丧失史学主体性、精神自主性和独立性，陷入“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尴尬境地^④。当然，严肃的历史学者和科学的史学研究从来都不反对不同观念与方法之间的交流互鉴，其所反对的，只是其中的庸俗的“拿来主义”和没有是非原则的“跟风逐浪”。

著名历史学家王家范先生曾说，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都要立足于“通贯和整体诠释的角度”^⑤，把历史说透彻、弄明白。这真是精妙之论。要从“贯通”与“整体”角度切入历史，全面深入地研究和分析历史的来龙去脉，特别是深蕴其中的“历史之理”，如果离开了“通史观念”“通识意识”，就绝无可能。说到底，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历史学研究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科学研究，是人文情怀与科学精神的有机统一，其目的是为了做到彼此契合、相互成就，充分实现其社会功能。人们如果仅仅只是满足于局部现象的描述或“碎片化”的研究，那么，历史学就变成了考据学和史料学，历史研究就变成了“讲故事”和“找史料”，就无法科学地揭示史料之间的有机联系和故事背后所蕴涵的事物发展的整体性、规律性本质，也就不可能生发具有思想穿透力的历史认知与历史启示^⑥。

因此，笔者认为，史学研究工作者如果能够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史观和历史发展规律论，聚焦中国与世界、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历史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根本问题，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侵扰，超越历史的现象性描述和碎片化追问，感知历史跳动的脉搏，紧贴历史问题的时代性，揭示历史现象背后的发展规律与当代启示，就一定可以从史学研究的视角科学地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就一定可以在史学研究过程中“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

结 语

科学总结并运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史的宝贵经验，可以发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求真与致用的双重品格”^⑦。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史家主体不仅需要具有“求真”的品格和勇气，还要具备“致用”的胆识、树立“致用”的目标，守科学研究之正，创史学研究之新，不断推陈出新，做有思想穿透力的研究，出有思想穿透力的成果，努力造就中国史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而要做到这一点，其前提就是：史学研究者必须正确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自觉突出和体现主体意识、理论意识和时代意识，把“出思想”、“出

① 章开沅：《我的史学之路》，见《章开沅文集》（第八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8页。

③ 张艳国：《史学理论：唯物史观的视域和尺度》，第258页。

④ 参见张艳国：《史学理论：唯物史观的视域和尺度》，第337-339页。

⑤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绪言”第1页。

⑥ 参见张艳国：《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人民日报》2021年11月8日，第13版。

⑦ 左玉河：《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

精品力作”作为史学研究的职业精神和毕生追求。惟其如此,才能不断克服如有论者所指出的繁琐考证、碎片堆砌、忽视理论、忽略全局等影响史学研究广度、深度、厚度、高度、力度和温度的不良现象,才能使当代中国史学研究在“永无止境的远航”中,发挥强大的事业凝聚力、思想塑造力、理论引导力、学术影响力和文化辐射力。笔者相信,史学研究者只要能够自觉地聚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旗帜下,运用唯物史观的思想利器深入开展历史研究,就一定能够做到“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

责任编辑 肖海燕

To “Launch High-Quality Works with Penetrating Thought” with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Zhang Yanguo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Abstract: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the New Er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not only providing great support to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but also defining the important position and role of the history discipline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It has created preciously rare conditions,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for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y studies. Xi Jinping put forward the important requirements and goals of “launching high-quality works with penetrating thought”,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o achieve this goal, it is necessary to be guided and inspired by the wisdom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ory.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rovide the source of thought and reliable path for historians to “do” and “launch high-quality works with penetrating thought”.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we can at least start from three points: first, finding the historical orientation of research, basing it on the problem, and highligh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times; second, studying and explaining the nature and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closely following Marxist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forms; third, adhering to the Marxist overview of history and the law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ory, and focusing on China’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process of world history. In short,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historians are not only supposed to have the character and courage to “seek truth”, but also have the courage and set the goal to “practice”. In addition, they should adhere to the integr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e historical research, conduct thought-penetrating research, produce thought-penetrating works, and spare no effort to create a new situation for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Key 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enetration of thought; historical research; high-quality works